

# “诗仙”其实离我们很近

□薛天纬

李白来到人间,就带着“仙”气,“惊妾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白《草堂集序》),他的母亲梦见长庚(太白金星),他就降生了,他的名和字都来自天上那颗明亮的星。唐玄宗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朝,在长安紫极宫遇到前辈诗人贺知章,贺知章读了《蜀道难》,激赏其风姿才情,送他一个“谪仙人”的雅号,用民间的话来说,就是“文曲星下凡”。李白崇尚仙道,“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往往在诗中营造“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这样的仙境。“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杜甫《春日忆李白》),李白诗风俊逸,诗思壮伟,诗笔纵放,诗才敏捷;长鲸跋浪,天马行空,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手下忽然片云飞,眼前划见孤峰出”(任华《杂言寄李白》)。这许多因素叠加起来,使李白在后世赢得了“诗仙”的美名。然而,“诗仙”似乎也会拉开诗人与读者的距离,胡适讲他读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的感受,就说:“这种态度与人间生活相距太远了。所以我们读他的诗,总觉得他好像在天空中遨游自得,与我们不发生交涉。”并且把李白与杜甫相比较,说“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则总是‘天上谪仙人’而已”(《白话文学史》)。

其实,李白与杜甫的区别只在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说的“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李白属前者,杜甫属后者。李白的诗篇大多是以“我”为主体的个人抒情之作,而不同于杜甫诗之多写社会现实。然而,李白的个人抒情却与古今千万普通人心思相通,换句话说,他是我们的抒情代言人。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20字的《静夜思》,至今仍是年轻妈妈教给牙牙学语的孩子首选的“语言文学教材”,是民族的“文化乳汁”。诗抒写“乡愁”,孩子虽然不懂“乡愁”,但这“文化乳汁”却灌注进了他幼小的心灵,使他记忆终生,享用终生。“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抒写友情,把友情写得如此真挚,如此浅白而又如此深邃,古诗中实无第二例。桃花潭如今成了著名景区,南北游客慕名而来,为了观赏美景,更为了现场体味这动人的友情。“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出自李白《长干行》的诗句,为汉语增添了两个爱情专用语: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表现纯真爱情,没有比这两个词更美好的了。

李白与许氏夫人育有两个孩子,女儿平阳和儿子伯禽。许氏去世后,李白寄家东鲁。他到南方漫游,三年未归。春天,离家在外的李白思念一双儿女,《寄东鲁二稚子》诗写道:“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李长之感慨道:“漂泊的李白,没有家的李白,狂歌度日的李白,他却是有着一颗多么与普通人逼近的,相通的心!”(《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以上讲李白诗中的多情、友情、爱情、亲情,都是浸透于世俗生活的“人之常情”。“人之常情”盖出于人性,是人性的天然需求。然而,这些尚不是人性的核心。人性的核心是人的发展欲望。人是社会之人,出于人性的本能追求,人皆具有发展欲望,即要成就一番事业而不能虚度此生,要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使自己人生出彩。李白生活在皇权时代,时代决定了包括他在内的士人(读书人)的发展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步入仕途,建功立业,实现儒家所崇尚的“达则兼善天下”的人生价值。唐

朝实行科举制度,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可谋得官职,实现其发展。然而,李白不同于一般士人,他把人生发展的目标设定得极其宏伟:“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他要做位极人臣的宰相。不仅如此,李白还把实现宏伟目标的路径设想得十分浪漫:“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他把其人生志向比拟为“大鹏之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在常人看来,这实在太脱离实际。但李白却自信而且执著,终生为之奋斗不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他遭遇过艰难挫折;“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他慨叹时光如逝水而功业难成就;“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他为胸中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了无尽的“愁”,他把自己的“愁”称为“万古愁”。但他始终对人生前景满怀希望,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期待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曾有过幸运,42岁时被玄宗征召,进入翰林院,做了翰林待诏,一时极备荣宠,风光无限。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半,李白就失望了,因为他的身份只是“皇帝侍文”,只能以诗歌才能为皇帝的享乐生活服务,而不可能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功业抱负。于是,他“上疏请还”,主动离开了朝廷。他更遭遇过不幸与灾难,“安史之乱”中,他怀着一种爱国热情受永王征召入幕,不料却陷入皇室内斗的漩涡,以“附逆”罪被判长流夜郎。饶幸遇赦后,晚年流落江南,贫病交加,贫志而死。“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李白的人生理想最终没有实现,他的人生结局是悲剧的,但他的精神以及承载其精神的诗歌却传之不朽。

还是李长之说得对:“他有悲,我们也有悲,他有喜,我们也有喜,并且他所悲的,所喜的,也就正是我们所悲的,所喜的”,“然而有一个不同,这就是他比我们喜、喜的利害,悲、悲的利害,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那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了”,“就质论,他其实是和一般人的要求无殊的,就量论,一般人却不如他要求得那样强大”。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我们,人生发展道路、发展空间较之李白的时代广阔得多。每个人都有事业发展的欲望,都会设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都会有“悲”或“喜”的感情体验,这些都出自我们的人性。李白对“发展”这一人性主题的浪漫诗性表达,能激起我们的强烈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是张扬人性的一面旗帜。

社会生活的进步无止境,人的发展也无止境。李白诗歌能为人们追求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李白并没有远去,他不仅属于今天,而且属于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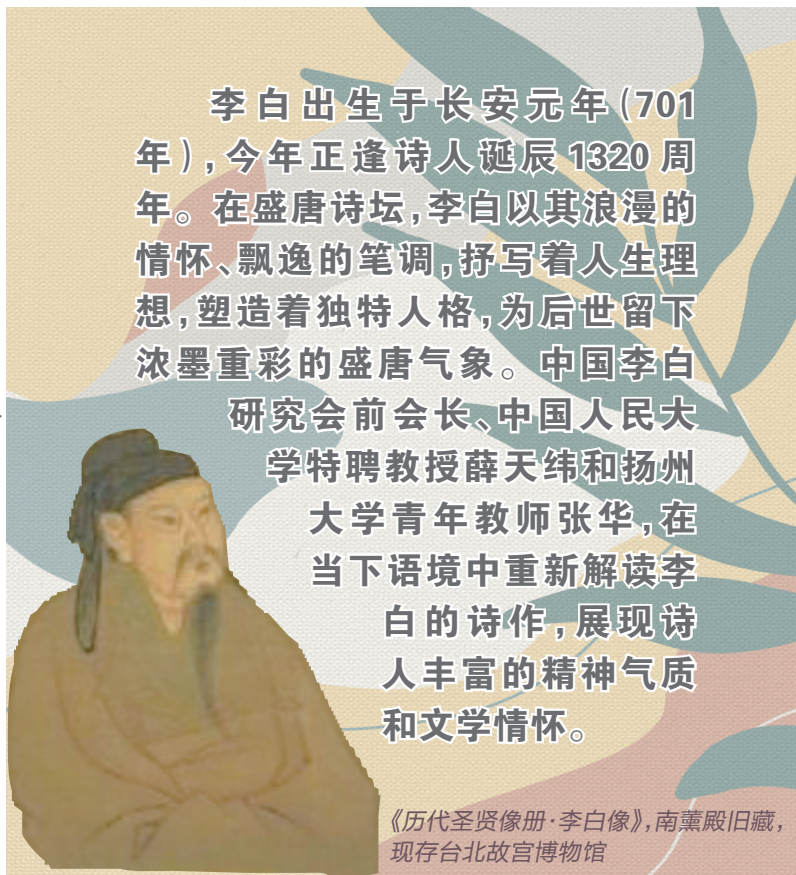
## 志在删述 辉映千春

□张华

中国诗歌发展到盛唐,声律、风骨俱备,正式踏入黄金时代。作为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李白长期游离于政治中心长安,直到天宝元年(742年),时年42岁的李白奉召进京,出任翰林待诏。所谓待诏,其实就是唐玄宗的文学侍从,属于闲职。这与李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远大志向有着不小的差距。临行前,李白写下《南陵别儿童入京》,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吐胸中的郁积。多年的奔走干谒终于敲开了朝堂的大门,李白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诗坛的新宠,“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任华《杂言寄李白》)两年多的长安岁月,李白留下了众多的奇闻轶事,如金龟换酒,饮中八仙,力士脱靴,醉草吓蛮书等等。这些为他赢得了“谪仙人”的称号,其洒脱不群、才华横溢的形象也深入人心,成为后世对诗人李白的的主要认知。

在诗文中,李白塑造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独一无二的自我形象。首先,他是一个侠客,“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与韩荆州书》),他时常称颂自己的豪侠之举,“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回忆起在扬州接济落魄公子,散金30万的壮举,自豪之情跃然纸上。在李白诗作中,有许多刀、剑、酒等与侠客相关联的词语,而最能体现其侠客情结的,当属《侠客行》。其次,他是一个高士。李白曾在终南山、嵩山、庐山等地隐居。隐士的身份,为其被玄宗征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赋予了其诗作清丽的色彩。“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客来闻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这是醉后隐士的真率;“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这又是隐逸的妙趣。最后,他是一个道教徒,同时也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圣贤。天宝三载(744年),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所谓“赐金放还”,往往用在佛道士身上,而李白也在“诏令归山”的当年在齐州投道篆,成为一名正式的道士。道教信仰,一方面丰富了李白诗歌创作的题材,如其诗集中诸多写服食炼丹的诗,以及与道教人士的唱和;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李白诗歌的想象空间,如其诗中想落天外的夸张。作为一个道教徒,李白并不曾在道教教义上有任何阐发,而作为一位士人的他,则继承和发扬了正统诗学主张。在《古风·其一》中,李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诗学观念,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又说“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在诗学上主张复古,并将孔子“文质彬彬”的文学主张作为信条。陈贻焯先生认为:他最主要的理想,是为帝王辅佐,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才遂其隐逸出尘、成为高士甚至神仙的浪漫理想。(《唐诗论丛》)

在诗中,李白塑造着一个境界开阔的盛



《历代圣贤像册·李白像》,南熏殿旧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唐时代。李白好游历名山大川,少年时代,李白即遍访蜀中戴天山、大匡山、峨眉山等。24岁时,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说自己“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庐山的瀑布、天姥山的云海,还有敬亭山的独立,金陵酒肆的送别和黄鹤楼下的“孤帆远影”等等,经过李白的“俊赏”,这些景致经历了诗意的改造,具备了别样的文化品格。李白天性豪爽,交游广泛,盛唐人物也在他的诗中得到了永生。其中,既有大诗人,如杜甫、高适、王昌龄、孟浩然。“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表达了对杜甫的真挚感情;“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寄托着对友人的关切。同时,还有一些普通人或方外之人,有名有姓者如汪伦(《赠汪伦》),有姓无名者如五松山下的荀媪(《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方外之士如戴天山道士(《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蜀僧潜(《听蜀僧弹琴》)。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从李白的诗中走来,或淳朴,或真诚,仙风道骨、琴艺高超,带来那个时代的万物人情。李白的诗虽不及杜甫“诗史”的美誉,但对时事与民生也多有关注。写战争的,有“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哥舒翰,有“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古风》其三十四)的南诏之役;反映民间疾苦的,如反映纤夫劳苦的《丁都护歌》,以及被郭沫若称为“歌颂治矿工人为宜的一首”(《秋浦歌》其十四)。至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游子 and 思妇这两大叙事母题,在李白诗中随处可见,如《静夜思》《春思》《子夜吴歌》等。林庚先生说“李白是歌唱了盛唐时代的”(《唐诗论丛》),在李白的诗中,我们既能真实地看

到那时的人和那时的物 and 那时的事,我们同样也能感受浑厚与雄壮的盛唐气象。在同时期的诗人中,与清淡的王维、沉郁的杜甫相比,个性张扬的李白更能体现盛唐的时代特征。首先,盛唐是一个自信的时代。李白的自信,是平交王侯、指斥人生的豁达。这种自信,即便是请求别人的帮助,也要夸耀自己“长不满七尺,男儿雄万夫……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与韩朝宗书》)这种自信,是面对世人的不理解时,还坚信“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浪水。”(《上李邕》)其次,盛唐是气势磅礴的时代。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形式还是语言,都体现出不同一般的气派。奇崛者,如《蜀道难》;境界全开者,如《渡荆门送别》中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而千古名篇《将进酒》《关山月》则在时间和空间上任意穿梭。再次,盛唐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李白诗歌的最高成就在歌行体,他常以此类诗歌抒写世路艰险与怀才不遇,如《行路难》《将进酒》《梁甫吟》等。作为乐府旧体,《行路难》往往用以书写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如鲍照的《行路难》二首。李白诗中,虽然也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踌躇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苦闷,然而在诗歌的结尾处,李白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为自己、为这个时代寻找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说不尽的“诗仙”李白,折射出的是道不完的盛唐气象。文学创作,只有与时代主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作品才能称得上是经典。在盛唐文化的浸润下,盛唐诗人既写边关塞漠,也写山水田园,从庙堂到江湖,全方位地展现着时代的风采。作为盛唐诗人的杰出代表,李白自觉承担起鼓手的角色,书写和建构了他眼中的盛唐,为后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济慈》约瑟夫·塞汶作(Joseph Severn, 1821),现藏于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

2020年12月,伦敦佳士得拍卖行为纪念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逝世200周年,拍卖了一幅济慈的画像和他的一具遗容面模。画的创作者是济慈的生前好友、画家约瑟夫·塞汶(Joseph Severn, 1793-1879)。画中的济慈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椅子上,身体微微前倾,一只手臂撑在另一把靠背椅的椅背上,手掌撑着略微低下的头,另一只手放在膝头的书籍上。画面色彩艳丽,窗外蓝天白云,绿树成荫,飘逸的窗帘和诗人金黄色的头发相互呼应,微微张开的眼睛仿佛将目光投入寂静的空茫,整个画作散发着一股浪漫的气息。然而,这幅创作于1834年的画作并非塞汶创作的相关题材的首幅画作,与塞汶在诗人离世之后不久所创作的同一题材的画在气质和格调方面颇为不同,而那幅创作于1821年济慈辞世之后不久的画作,整个画面的色调相对来说较为柔和幽暗,衬托出更为平和宁静的气氛,准确地传达出济慈的精神气质。

1820年秋,济慈的肺病日益加重,医生建议他去往意大利南方温暖的地域治疗,以期他的病情能有所好转。当年9月,济慈登上前往那不勒斯的船只到罗马养病,陪同他一同前去的正是他的好友画家塞汶。济慈居住在罗马的几个月里,塞汶倾尽全力照顾病重的济慈,与诗人共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1821年1月,济慈的身体每况愈下,此时的诗人日夜被恶魔般的疾病和临近的死亡恐惧所侵扰,时刻经受着痛苦的折磨。这生命的磨难时常扰乱画家的内心,令他深感不安,而只有在诗人睡着之后,慢慢进入了梦境,那个往日里沉静、温和而睿智的诗心才会回到他那清瘦而瘦削的体内。就在济慈临终前的某日,塞汶趁诗人熟睡之时画了一幅沉睡中的诗人肖像。那是一幅构图简约、色彩清淡的水彩肖像。诗人的头微斜地靠在枕上,略显散乱的头发随意搭在他憔悴而清瘦的面庞,那曾经唱出诗人心灵中永恒之美的双唇此刻轻轻地聚拢在一起,那曾经洞察世间的斑斓色彩、望穿人间冷暖的双眼温和地紧闭,生命仿佛融进了夜里的寂静,将人们带入了宁谧的永恒。然而,对于济慈来说,沉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进入了另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仿佛在聆听彼岸的召唤,一步步走向超然的悟。1821年2月23日夜,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开始了他永恒的睡眠,他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相伴,不曾离别。

济慈的病中经历和长眠强烈地撞击着塞汶的心。不久,他便开始凭记忆创作济慈的画像,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济慈离世后,那印象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如此强烈的伤痛,我要在这幅遗作中努力唤起最为愉快的记忆。”那是1819年5月的一天,他去拜访济慈,诗人当时住在朋友查尔斯·布朗坐落在伦敦汉普斯特德的住所。塞汶轻轻走进济慈的房间,只见他此刻正在房间中低头读书,并未意识到友人的到来。那身体的姿态,双手摆放的姿势,屋内的环境一如前述的1834年的画作,而色调和气氛却与那幅画作有所不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幅画作中诗人的眼睛低垂,仿佛他正凝神于膝头翻开的书籍;也许,诗人正将眼睛轻轻地闭拢起来,沉浸于他独自的想象的世界中。那神情、那仪态仿佛他沉入了寂静的酣眠,正由一个世界的精灵带入永恒的旷世之美。画家感动于眼前的诗人这凝神的景象,感到了心灵在这沉静的幻境中获得的愉悦。他将这愉悦定格在这幅朴素而又贴合诗人精神内核的精美画作之中。

好似上天在冥冥中有所感知,塞汶来访的当天,济慈恰巧创作了他不朽的《夜莺颂》。这是他六大颂诗中最广为人们称颂的一首。在诗中,诗人表达了他对远离纷扰的尘世,追随夜莺的歌声,去往幻美他乡的渴望。诗一开篇诗人就在欢乐和痛苦的叠合中坠入忘川,仿佛在睡梦中追随夜莺去聆听悠扬的音乐,去啜饮甜蜜的佳酿,去吮吮幽冥的林中那阵阵暗香。此时的诗人远离了现

## 睡眠与生命

□章燕

1821年2月23日夜,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开始了他永恒的睡眠,尽管他25岁的青春年华定格于此,但他的生命却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相伴,不曾离别。在济慈逝世200周年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章燕从诗人与睡眠相关的诗歌作品出发,结合画家约瑟夫·塞汶的济慈画作,引领我们触摸诗人丰富而驳杂的精神内核。

实中的悲苦,登上了澄明的天宇,穿越古今,跨越生死,于梦幻中飞往一个永恒的所在,一个灵魂的永久栖息地。可以看到,诗人对永恒幻美的追寻总是与睡眠、与梦幻相生相伴,那至高的欢乐甚至与死亡融为一体,而醒来,现实的一切皆为苦痛和磨难。当夜莺的歌声渐渐远去,失落在深深的密林幽谷之时,诗人不禁对这幻美之旅发出疑问:“这是幻象?还是醒时的梦寐?/音乐远去了:——我醒着,还是在酣眠?”在诗人看来,对美的追寻和向往,对生命的真实体悟和感受往往与沉醉和酣眠相连,而现实中的此在渐渐隐去,留给诗人的是心灵的醒来、想象的跃动和悟性的萌发,那是一个善与美的世界,跨越了生死和有限的时空。

济慈的一生创作了多首与睡眠相关的诗作,他的诗中时常流露出与酣眠的亲近、对酣眠的渴望,仿佛那是他的灵魂接近永恒的至善至美的路径。1818年晚秋,他创作了《睡着了,睡一会儿吧》,呼唤“天国的福祉降临你的眼睛,/让我的呼吸融入那幸福的空气——”在诗人的心中,睡着了,进入了沉静的梦境,而此时正有那天国的福祉降临于合拢的明眸。1819年4月,就在济慈创作《夜莺颂》之前不久,他创作了十四行诗《致睡眠》:

哦,安静的午夜里温柔的送香者!  
你用细心而慈祥的手指合上  
喜爱朦胧的双眼,遮住夜色,  
让眼睛荫蔽在神圣的遗忘之乡;

甜甜的睡眠呵!如果你乐意,就请在  
你歌舞的中途,合上我甘愿的两眼,  
要不就等到“阿门”之后,你来  
把罍粟催眠的好意洒到我床边;

然后请救我,否则逝去的日光  
会照到我枕上,引起一串串悲哀;

诗人将睡眠称作午夜温柔的送香者,其原意指以香膏药物涂抹尸体而使之不朽的人,而这里,诗人认为,睡眠正以另一种形式使看似无生命的身体成为不朽,它细心地合上双眼,在幽暗而静谧的朦胧里,眼睛受神圣的遗忘之乡的荫蔽,获得了至高的幸福。

1816年,济慈在他早期的重要长诗《睡与诗》中表达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诗歌创作的决心,也探讨了睡眠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此处的睡眠仿佛诗人灵魂中的一种未醒的状态,然而,正是未醒的情致带给他诗的幻想,将他领进神话中的仙境,让他去感悟自然中的美景,去体验世间的悲欢,人生的苦难。诗人在开篇的诗行中就提出这样的疑问:世间有什么能更令人愉悦,更使人安详,更富于想象?接着,他答道:

只有你,睡眠!合拢眼睑的纤手!  
低唱着温柔的催眠歌曲的翅膀!  
绕着惬意的枕头轻翔的翅膀!  
用罍粟和垂柳编织桂冠的工匠!  
你呵,悄悄地把美人的头发弄乱!  
你愉快地谛听晨光的赐福,祝愿  
你有幸开启千万双欢乐的眼睛,  
让灵活的明眸迎接旭日东升!

这样的睡眠恰如精灵一般赋予诗歌以灵感、以荣耀,它用高贵、奇异、庄严和美丽将诗歌装点,是诗歌灵感永不枯竭的源泉。诗人在这里将睡眠与诗歌融合在一起,这并非教诗人远离现实,逃避苦难,沉溺于幻想,而是以一种诗感性、悟性的清醒对峙。睡眠是一种朦胧的未醒状态,它不用理性的思,而是用感性的悟去接近世间万物,去理解人性,去融入生活。这未醒的状态能够让崇高的想象自由地腾飞,直达天宇,扫除一切束缚和教条,赋予人以同情,使人与万物契合,与自然同一。而只有这样的诗才能让他去“追寻更崇高的生活,去发现人类心灵/深处的痛苦和撞击”。

可以说,济慈所赞颂的睡眠蕴含着诗性的清醒、心灵的清醒和想象的腾跃,他所追寻的睡眠是心灵在更高层面上的悟,是思的未醒之醒。它成就了济慈的诗歌美学,也成为济慈的人生美学。他赞美睡眠,也歌颂睡眠所带来的幸福,更崇尚睡眠中孕育的崇高与永恒。而他以25岁的青春年华将生命定格在不朽的睡眠之中,走向了永恒,与人类同往。

这沉静中的睡、悟与思成就了塞汶这不朽的画作,更成就了济慈伟大的诗篇和人生。

重读经典